

多元、通俗、查某祖： 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的歷史再現

林姵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中文摘要

以往關於台灣殖民經驗之討論大多聚焦於二十世紀，但近年來隨著史料與相關研究的出版，荷治時期歷史漸被小說家納入視野。本文採文本細讀，並適度配合葛里桑的「關係詩學」框架，從多元的視角、通俗的鄭成功描繪、女性等三個面向分別析論陳耀昌 2012 年的小說《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的歷史再現。論文採新歷史主義立場，認為小說與歷史沒有絕對差異，不論小說的織造或歷史敘述最終均將導向宏觀的人文研究，意在呈現某些（若非全部）先前被排除在外的聲音和視角。以如此角度去解讀《福爾摩沙三族記》，則可更清晰地理解「多族」敘述的重要與必要，以及各族群之間彼此相關但又不同的不斷變化的文化互動與互涉。此外，筆者也細論《福爾摩沙三族記》中人性且通俗的鄭成功陰翳面的側寫，並探索以荷蘭女性為主要視角可啟動的關於台灣認同和歷史再現的敘事倫理及理論能量。

關鍵詞：多元敘述、歷史再現、《福爾摩沙三族記》、鄭成功、關係詩學

**Multiple, Popular, Matriarchal: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Chen Yaochang's
*A Tale of Three Tribes in Dutch Formosa***

Lin, Pei-yin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HKU;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Visiting Scholar (2015-16)

Abstract

The study on Taiwan's colonial experience has for a long while concentrated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relevant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history under the Dutch rul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topic of Taiwanese writers. Employing Glissant's "poetics of relation," this essay provides a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Chen Yaochang's 2012 novel *A Tale of Three Tribes in Dutch Formosa* from three specific aspects: its multiple perspectives, popular portrait of Koxinga, and female-centric narration. It adopts the stance of new historicism, considering there is no absolute difference between fiction and history, as both fictional emplotment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eventually lead to broad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with an aim to show certain (if not all) previously excluded voices and viewpoints. On the basis of this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multi-tribe" narrative, and the forever-changing intertribal cultural interactions, can be fully appreciated. In addition, this essay

scrutinizes this novel's humanistic yet popular depiction of Koxinga's dark side, exploring the narrative ethics and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concerning Taiwan's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evoked through the novel's focus on the Dutch females.

Key words: Multiple narrativ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 Tale of Three Tribes in Dutch Formosa*, Koxinga, poetics of relation

多元、通俗、查某祖：

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的歷史再現

以往關於台灣的殖民經驗之討論大多集中於二十世紀，例如長達五十年的日本統治，而隨著持續勃發的福佬文化國族主義，二戰後的國民黨統治亦被以殖民經驗視之。相形之下，關於荷治時期（1624-1662）的探討仍有不少值得開發的空間。過去十多年來，隨著一些學術著作的相繼出版以及相關史料的譯介，此現象（至少就歷史研究來說）已有明顯改善¹。正如在大航海時代，因著地理

¹ 英文論著例如 Tonio Andrade (歐陽泰),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及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前者耙梳了十七世紀各族（荷蘭人、西班牙人、及漢人）在台的互動，後者則為由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史實鋪陳而來。邱馨慧 (Hsin-hui Chiu) 的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則分析原住民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漢人移民者之間的關係，亦有可觀之處。史料方面，除了村上直次郎（日）譯，已有中譯本的《巴達維亞城日記》，以及包樂史 (Leonard Blussé) 與人合編，江樹生譯註的四大冊荷文資料《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外，亦有四冊《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The Formosa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及程紹剛譯自荷文《東印度事務報告》的《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等。囿於篇幅，未能一一列舉。以上列舉資料詳細參考：村上直次郎日譯(パタヴィア城日誌)、郭輝中譯，王詩琅、王世慶校訂，《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村上直次郎日譯(パタヴィア城日誌)，中村孝志日文校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三)(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00年)。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1999年)、《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4年)、《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10年)。包樂史等編，林偉盛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1冊 1623-1635 (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年)。包樂史等編，康培德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2冊 1636-1645 (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年)。包樂史等編，《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3冊 1646-1654 英語版 (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06年)。包樂史等編，《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4冊 1655-1668 英語版 (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11年)。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

位置為兵家必爭之樞紐，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向來是各類文化共生互利，也彼此衝撞，對過去歷史之陳述也因此有著不同的視角和觀察²。藉由漸趨完整的史料輔助，現今讀者已可大致拼湊出這段時隔三百多年前的歷史面貌，台灣的歷史也得以走出在中國籠罩下或日本帝國壟斷下的邊緣地位，從歐洲世界的大航海時代的恢宏觀照下被重新檢視。

無獨有偶，這段荷鄭時代的歷史也成了小說家筆下的靈感源頭。早在 1997 年，王家祥即推出由 12 個短篇小說結集而成的《倒風內海》³，以西拉雅族為中心，鋪陳了他們歷經荷蘭人統治，郭懷一事件，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等經歷，及其巫師預言他們即將受漢人統治的未知命運。2011 年及 2012 年，以挑戰官方大論述著稱的平路先後在其作品《東方之東》及《婆娑之島》中演繹這段過去。前者對鄭氏父子的心路歷程與不同的追求頗多揣想⁴，而後者則試圖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台的末任長官揆一（荷蘭語：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與台灣原住民女性的愛慾烘托出發生在台灣島上的多段權力交迭。陳耀昌於 2012 年推出的力作《福爾摩沙三族記》則為荷鄭時期的小說再添一筆。《福》書雖是文學創作，但作者在大量閱讀荷治時期的相關書籍史料後才提筆寫就。陳耀昌本人在受訪時則表示⁵，上述的《熱蘭遮城日誌》以及曾為鄭軍俘虜，在鄭成功麾下工作的土地測量師 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 所著的《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皆為其參照的背景資料之一⁶。陳的歷史意圖十

² 例如陳宗仁在評論鮑曉歐的論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時即特別強調此書的「西班牙人觀點，而上述歐陽泰的專書則是「美國學者的觀察」。參見陳宗仁，〈評鮑曉歐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台灣史研究》17 卷 1 期（2010 年 3 月），頁 211-222。鮑曉歐，李毓中、吳孟真譯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台北：南天書局，2008 年）。

³ 王家祥，《倒風內海》（台北：玉山社，1997 年）。

⁴ 關於《東方之東》的兩性關係與兩岸政治，參見 Pei-yin Lin 的“Gender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Romance and Geopolitics in Li Ang’s Seven-Generation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and Ping Lu’s East and Beyond,” *Archive Orientani* (January 2014), pp. 515-538. 平路，《東方之東》（台北：聯合文學，2011 年）、《婆娑之島》（台北：商周出版社，2012 年）。

⁵ 參見蘇惠昭，〈幹細胞專家陳耀昌的福爾摩沙夢〉，《光華雜誌》37 卷 5 期（2012 年 5 月），頁 98。

⁶ 此書為梅氏逐日記錄的「戰地報導」，由江樹生譯註，2003 年出版。梅氏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來台的土地測量師，旅台十九年。曾於 1661 年 4 月 30 日親歷鄭成功率兵登台，也因此受困於普羅岷西亞城堡（今日的赤崁）內。5 月初，他同城堡內的兩百七十多位名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至 1662 年 2 月 9 日離開台灣當中的約九個月左右光景，曾協助鄭成功翻譯，土地測量，也參與鄭氏與荷蘭人間的談判，故其「日記」為研究鄭成功其

分明顯。在小說楔子之前，陳耀昌即表示希望藉此小說「為台灣留下歷史，為歷史記下台灣」，小說末的後記則坦言，除了故事中虛構荷蘭牧師亨布魯克之次女（瑪利婭）來貫穿情節外，其餘「盡量保持歷史原貌」，希望這個故事「更接近『小說化歷史』，而不只是『歷史小說』」⁷。

作者如此厚重的歷史欲望不但為此小說的催生劑，也為本書敘述的亮點。然截至目前，雖在媒體上不乏推薦，但未見有學術論文分析此書。一如書名所揭示，小說觸及（至少）三個族群的歷史記憶。故事開始前的推薦文中，部分學者談及《福爾摩沙三族記》的多元史觀⁸，而也有學者就「歷史小說」這個敘述模式切入⁹。但不同族群間的歷史如何交匯，又形成怎樣的互動關係網絡，而歷史與小說是否真的可以截然二分，都有再探討的空間。是故，本文將針對書中的歷史再現做深入分析。基於歷史本身亦是一種敘述，筆者關注點不在於文本當中哪些為真實，哪些為虛構，而是將此一史實加想像的敘述視為一修辭特色來析論背後的意涵，擬以三個修辭特色——即多元、通俗、查某祖（閩南語意為「女性祖先」）分別切入，探究《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的多族群角度歷史敘事，鄭成功的側寫，以及以荷蘭女子為想像的楔子的結構。除了文本層次的分析，筆者也將適度借用馬丁尼克作家及文化評論家愛德華葛里桑（Édouard Glissant, 1928-2011）提出的「關係詩學」（Poetics of Relation，亦有譯為「相關詩學」）概念來進一步闡述《福》一書中的歷史演義所帶出的敘事倫理，同時也將藉由《福》一書的形式來重審小說與歷史之間的關係，並在結論時，對此書在當今台灣社會的認同政治上的意涵提出看法。

一、變動中的多元種族融合

《福爾摩沙三族記》全書分為九部分。第一部「生」，第九部「命運」，交織出台灣自 1646-1662 年間的故事，背景時空基本上與為期三十八年的荷治時期重

人共事的珍貴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名為「日記」，實為梅氏「口供」，為了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解釋其之被俘並未損及公司。此乃本文匿名審查者對筆者的提示，謹此致謝。

⁷ 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台北：遠流，2012年），頁386。之後引文頁碼直接標識於正文。

⁸ 參見孫大川、陳芳明、胡晴舫的推薦文，《福爾摩沙三族記》，頁17-18，19-20，21-23。

⁹ 參見李瑞騰的推薦文，同註8，頁13-14。

合。一如書名，小說由三條主要敘事線，即荷蘭人（來台宣教的亨布魯克牧師一家，特別是他的二女兒瑪利婭）、原住民（麻豆社的少女烏瑪）、漢人（主要包含鄭成功，及替鄭氏父子工作的陳澤）共構而成。書中對這三個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及磨合過程多所著墨。三者之間的互動，並非簡單的誰影響了誰的單向文化傳布，或單一霸權對其他兩者的宰制，而是呈現動態的，隨機的實用主義。

荷蘭人與台灣的原住民之間的主要差異呈現在民俗和信仰方面。最能突顯荷蘭人和原住民的矛盾可見於麻豆社的領袖之一里加。里加向來對荷蘭人沒有太多好感，他信仰阿立祖，不滿荷蘭人迫害疍姨（西拉雅族主持宗教儀式的女祭司，為人神之間的媒介），對荷蘭人對原住民獵鹿的多所限制也不以為然。但他卻接受了荷蘭人因「懷柔」之考量而提拔他為「頭人」（類似部落代表）之職。他進一步思索，周遭的一些荷蘭人和漢人都已娶原住民女子為妻，成家生子，某程度已認同了這塊土地，不該再將他們視作外人。可見，里加即便對荷蘭人的一些舉措反感，這種情緒卻並非絕對的勢不兩立，而是複雜並充滿矛盾的。同樣身為原住民，麻豆社的前長老的女兒烏瑪卻是十分虔誠的基督徒，然即便如此，她也同樣在遭逢天災之際，參與了自己部落原有的夜祭儀式。原住民與荷蘭人之間的關係有時因為別的族群牽涉其中而更形複雜。例如烏瑪的父親即因新港社（另一西拉雅群體）為荷蘭人效力，突襲麻豆社時喪生。而當時的漢人移民族群也不時扮演著中介的關鍵。以原住民們的獵鹿習俗來說，荷蘭人發令禁止獵鹿主要即因已「標售獵鹿權給出價最高的漢人商人」（《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158），為了保障承租獵鹿漢族商人的權益，而不得不下此禁令。

除開生活慣習，自然天災（如饑荒）亦是考驗各族關係的敏感時機。對於原住民來說，這是因部分族人改信荷蘭人的神，觸怒祖靈，才招來一系列的災害和饑荒。在這個節骨眼，漢人（例如在大員頗具影響力的漢人商人何斌，同時也是當時東印度公司的商館通事）甚至落井下石，嘲弄基督信仰並未給原住民帶來庇護，譏諷「荷蘭人做到流汗，卻被嫌到流涎」（《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159）。而同時，面對荷蘭人將原住民作為饑荒時的賑災重點，漢人們頗不是滋味，想起自己在捕殺蝗蟲時率先出錢出力，荷蘭人才起而效尤，更為荷蘭人的差別待遇忿忿不平。

而在人口政治上來說，三個族群的關係也相互勾連。例如，烏瑪向荷蘭牧師之女瑪利婭抱怨自己部族的女孩有愈來愈多人想嫁給漢族，而原住民的土地也逐漸被漢人買走時，瑪利婭即警覺地自省，荷蘭人作為少數族群，卻儼然以統治者自居，要漢人及原住民來學習荷蘭文，但也因漢人並非主要的宣教對象，因此荷蘭人本身對學習漢人語文興趣缺缺。但無論如何，她認為漢人的勢力不容小覷。而當何斌捐款投靠鄭成功時，瑪利婭甚至靈機一動，獻計說，揆一不應只仰賴巴達維亞的援軍，而該主動與大清國聯合，共同圍剿鄭成功，再度呈現漢人與荷蘭人之間的競逐與緊張關係。

小說的第六部開始重點轉向鄭成功及其舟師，於 1661 年 4 月 30 日沿鹿耳門進入台江，直攻赤崁地區的普羅岷遮城（今日的赤崁樓）。普羅岷遮城不久即不戰而降。荷蘭人此次的潰敗也與當地原住民的倒向鄭氏勢力有關。藉由瑪利婭為視角，荷蘭人，漢人，原住民三族詭變多端的關係再度呈現。如：早在鄭成功部隊尚未登陸前，瑪利婭即感受到福爾摩沙人態度的轉變（例如：麻豆社的人又開始獵人頭，頗有挑釁意味），彷彿荷蘭教士們三十多年來的努力在一夕之間驟然瓦解。鄭成功也深諳箇中玄機，拿下普羅岷遮城後，不忘差遣屬下到原住民部落收買人心，以絕後患。而當瑪利婭一家也來到赤崁後，她才警覺福爾摩沙人對待荷蘭人竟然比國姓爺對待荷蘭人來得殘暴。正是因為麻豆社原住民的檢舉，導致兩位荷蘭人被虐殺。

如此各個族群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輪番上陣的敘述方式展現了一個多元的、多聲部的、共享的歷史觀點。在許多片段，不難看出作者藉由人物之口，將不同文化並置一起作比較。此一比較沒有所謂是非對錯，或好壞高低，十分類似馬丁尼克的文化評論家愛德華葛里桑提出的「關係詩學」概念。葛里桑原本念茲在茲的是在加勒比海諸國聯邦的框架下尋求馬丁尼克的獨立，但隨著此願望的愈來愈不可能，他轉而以「全世界」（tout-monde）之觀念來思考馬丁尼克的處境。他放眼世界，將全世界視作不同互動社群之間的網絡，而這些不同族群的接觸則生發無時無刻處於變動中的文化型塑。而其提出的孤立的馬丁尼克社會與其他文化「相關」（“relation”）之思考概念則試圖讓我們理解在「全世界」這個整體性（totality）的條件下，能如何去談論不同文化或族群的互動，

而同時避免過度概括化，或天真地將這個全世界視作一個均質的整體。誠然，葛里桑的政治動機（如尋求獨立）與荷治時期的台灣極為不同，其中明顯的差異即為葛里桑探討的是馬丁尼克與世界如何互動，而《福爾摩沙三族記》關注的則是十七世紀在台灣這座海島上同時共存的族群之間（inter-ethnic）充滿變動的文化交匯。儘管如此，葛里桑的理論仍值得借鏡，其中最耐人尋味之處為正因「全世界」之下的文化互動不斷地變化，故其為一個永遠開放性的概念。因此，所謂文化間之差異（即如何相互關聯）無法被死板地界定，而只能透過想像來談論隨時在衍化中的歷史與文化。也就是說，整體性的思考本身弔詭地即是對（任何最終定局）的整體的拒斥。如此便不難理解，何以葛里桑說「在關係之中，整體並非其部分的定局，因為此整體性中的多元即為多樣性。」¹⁰

葛里桑闡述，在一般認知中，要談認同勢必免不了尋根式地追本溯源，如此一來，作為對照的「他者」常以二元對立的姿態被生產，而非只是與自我不同的他者。值得注意的是，葛里桑的強調多元與變動並非是對認同議題的避重就輕。曾參與抵殖民的他，深知穩定的認同位置在抵殖民中的重要。他重申認同位置與「關係」這個概念，兩者不但不相互抵觸，前者其實可以強化後者。但僅意識到自我的特殊性並不足以（讓被殖民者）擺脫同化，這個主體認同還需透過「關係」的實踐方能做實¹¹。「關係」的實踐在此語境下顯然是一種政治的介入，但對葛里桑來說，這一介入只能在詩學的表述下才能有最完整的呈現。簡言之，葛里桑的「關係詩學」更強調文化交匯後的混生過程，而非單一文化的根本，他認為唯有正視在共享的整體性之下，具差異性的共時，重層的歷史共存，並及早認清以對立為主的主體型塑（即被征服者常藉由與侵略者對立或殲滅入侵者來建構自身認同）的侷限，方有解殖之契機¹²。

¹⁰ 英譯本文字如下：“In Relation the whole is not the finality of its parts: for multiplicity in totality is totally diversity”（筆者自譯），見 Édouard Glissant,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 Betsy W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 192.

¹¹ 同註 10，頁 147。

¹² 同註 10，頁 17。史書美曾結合葛里桑的「關係詩學」及其他理論，以「墾殖圍弧線」之概念來比較福克納、張貴興、翠西亞鮑威爾（Patricia Powell）的小說。參見史書美（Shu-mei Shih），“Comparison as Relation,” in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Baltimore: Johns

回到《福爾摩沙三族記》小說本身，三大族群各說各話，輪流被賦予歷史話語權的敘述手法，可說為台灣主體建構呈現了眾聲喧嘩的重層，但彼此「相關」之面貌。例如從亨布魯克口中，「漢人的歷史和希臘、羅馬一樣久」，「漢人沒有基督徒。他們所崇拜的孔子，像柏拉圖那麼早。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系統。」（《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81）不過在哈伯特牧師看來，「漢人是異教徒，有他們自己的文化習俗。福爾摩沙人比較單純，而且福爾摩沙人肯信基督。」（《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91）一再將漢人及原住民與西方文化並置。不過更為經典的展示「關係」史觀則可見亨布魯克對荷蘭治台的反思。他感嘆：「如果不是從事貿易所必需，公司過去並不熱衷於在海外佔領土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把貿易力量當作軍力來施展，荷蘭人應該不一樣，保持自由商人的身分四處遊走，這是荷蘭的立國精神與宗教觀。否則我們與過去幾十年來所反抗的西班牙人有什麼不一樣？」（《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95）至此，作者開門見山地透過亨布魯克來反思台灣歷史上經歷的重層殖民主義¹³。

在亨布魯克的荷蘭人觀點後，小說也安排了從原住民代表——麻豆社領袖里加的角度來「反觀」旅台多年的荷蘭人（及漢人）社群。隨著荷蘭宣教士們（和部分漢人）旅台時間愈久，且娶了福爾摩沙女子為妻，逐漸落地生根，在原住民領袖里加的心中卻是充滿矛盾的：

像優士德這樣的荷蘭人，或烏嘴鬚那樣的漢人，都娶了福爾摩沙女人，組成家庭，等於認同了福爾摩沙……他不應該再把他們當成外人。平常的日子裡，他們與原住民的感情不錯，然而實際上，優士德與烏嘴鬚等人在心態上認同了福爾摩沙的土地，卻並未認同原住民部落，並不認為自己是部落的一份子，因此部落的人也不怎麼喜歡他們。（《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166）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eds. Rita Felski and Susan Friedman, pp. 79-98.

¹³ 此處只反省了荷蘭人在台灣的治理，但可延伸至台灣歷史上不同時期、類型、程度深淺不一的殖民主義：荷／西時期（包含 1624-1662 荷蘭在初期在南台灣的統治以及 1642 年驅逐據守北部的西班牙人後占領全台，與 1626-1641 西班牙在北台灣的統治）；明鄭時期（1661-1683）；清統治（1683-1895）；日本統治（1895-1945），國民黨統治（1945-2000）。

里加的這個憂慮可被詮釋為作者陳耀昌對根源（root）認同的思索，將之與葛里桑的「關係詩學」並列來談，里加的擔憂不讓人意外，因為他的原住民的部落認同正是建立在對立的二元（內／外人）區分之上。或許也可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即台灣（福爾摩沙）這塊土地作為一個主體建構的空間基礎，其認同不宜只拘泥於單一的族群之上，而是應在這個共有的基礎之上，去理解彼此之間的相關差異。

小說後半段描寫鄭成功的鹿耳門登陸，亨布魯克奉鄭氏之命，到熱蘭遮城招降，以免無謂的流血戰爭。除了反映亨布魯克念在荷蘭人過去的努力耕耘而不願輕言放棄，故決意要奉勸熱蘭遮城內的同胞奮戰到底的邏輯，也折射出當時原住民對鄭、荷交戰局勢的觀感。例如：麻豆社的人們夾處兩者之間，決定盡可能保持中立。小說如此敘述原住民的觀點：「聽說鄭成功對荷蘭人說，這塊土地是他父親的，他來要回去。可是，這塊土地在荷蘭人來之前，明明是我們的啊，怎麼可能是漢人的，或是鄭成功的？」（《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265）又如「走了荷蘭人，卻來了更多的漢人」（《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266）點出了從原住民的視角而言，荷、鄭之爭帶來的不過是再度由外人來治理的重層壓迫。老一輩的人關心是否可以重回過去的生活方式，然而年輕一輩卻對一夕之間不需再學荷蘭文，以及是否要放棄學會以拉丁字母書寫西拉雅語感到困惑，無不說明在共享的福爾摩沙土地上不斷地變化中的三個主要族群的「關係詩學」。

在鄭成功之後湧入台灣的大批漢人移民，雖在人口比例上占絕對優勢，「反客為主」，但在歷史洪流中，這不過是動態的族群互動關係中的眾多可能性之一。我們不妨將這個關係網絡延伸至非人的動物族群——台灣土生的梅花鹿。在小說的第七十章「尾聲」，記述 1662 年荷蘭人撤離到當今台灣的編年。提及「1956 年，台灣北部最後一隻梅花鹿被原住民追捕射殺死亡」，「1969 年，台灣東部最後一隻梅花鹿消失滅絕。」（《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81）姑不論年份是否屬實，均提醒了讀者另一層相互關聯的（人與動物間的）詩學。從原住民的主要食物來源，到最後一頭原生種的鹿的絕跡，何嘗不是再一次的關係之轉化。

陳耀昌表示，希冀這部書是「小說化的歷史」。言下之意，重點在「歷史」而非「小說」，或者姑且可以「歷史小說」看待。然而，長久以來，歷史被賦予

一個認同建構得以仰賴的重要磐石，小說相形之下被視作「小」說，專業的歷史學者不時對其頗有微詞，而對小說之意義較為肯定的則認為小說有「補正史之遺」的作用。例如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詩人暨哲學家諾瓦里斯（Novalis）即認為小說在歷史的「缺陷」之下被催生而出¹⁴，之後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則主張「小說是歷史論述被壓抑的他者」¹⁵。元史學（meta-history）的理論家海頓懷特（Hayden White）則以德塞都的觀點為起頭，進一步闡述歷史論述力求客觀真實（the real），小說作為一種模擬（simulacrum）雖然對真實也有極大的興趣，但（小說家）卻是以想像力或不同可能性來呈現所謂的真。懷特大力強調人為主觀塑造（例如編纂者的修辭風格等）在型塑歷史論述中的作用¹⁶。

其實，類似的觀點，英國史學家卡爾（E. H. Carr）在 1961 年的《何為歷史》（What Is History?）中已作了探討。卡爾駁斥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只呈現當時發生什麼事」（nur sa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字面直譯為“only to say, how it really was,”即「只說確切發生何事」）之主張，認為並非歷史材料引領史學家，而是歷史學家們「主觀地」選取歷史事實（即他們決定什麼是重要的史實），而在書寫上他們也無法置身他們所處的社會之外（即他們對歷史事實的詮釋難免受當時的意識型態所影響）¹⁷。儘管卡爾與懷特的見解引發不同的反響¹⁸，但現今大多數學者承認歷史和客觀事實不見得等

¹⁴ 原文為“Novels arise out of the shortcomings of history”，引自 Richard Slotkin, “Fi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9: 2/3 (June/September 2005), p. 221.

¹⁵ 引自 Hayden White,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Fiction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ality,” *Rethinking History* 9: 2/3 (June/September 2005), p. 147。相關的中文討論可參見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2000 年），頁 37-126。針對所謂被（主流）歷史論述壓抑的他者，傅柯從瘋癲、懲戒等面向（如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和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來談權力與知識的關係也頗具啟發性。參考：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Vintage, 1988).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95).

¹⁶ Hayden White,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Fiction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ality,” pp. 147-157.

¹⁷ 參見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London: Penguin, 1961).

¹⁸ 黃俊傑、古偉瀛合寫的〈中國傳統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與「價值」的關係為中心〉，將海頓懷特與傅柯等人著述稱之為後現代史學，並分別列舉了支持和反對的聲音。支持者有：Keith Jenkins, Frank Ankersmit, G. Roberts, R.F. Berkhofer, M. Poster, Michel de Certeau, Paul de Man, S. Schama,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何偉亞（James Hevia），反對方有 G. R. Elton, J. Hexter, Keith Windschuttle, Perez Zagorin Arthur Marwick, Richard Evans 等。上述資料參考：黃俊傑、古偉瀛，〈中國傳統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

同，因為在歷史敘述中，可被確切記錄下的事實與「可能的」事實之間的縫隙正是藉由修辭、美學等文學上之建構來填補。

順此邏輯理路來思考，那麼，歷史和小說之間的本質差異（至少就以事實為基礎的書寫建構或再呈現來說）是難以被維持的。換言之，兩者的可信度（例如：事實之間的關係為何）皆無可避免地被質疑。誠如葛里桑，筆者並非全盤否定認同的重要或歷史敘事的意義，但或許可藉由「歷史小說」這個複合名詞來重思卡爾早在六〇年代即提出的「何為歷史」。我們或可將「歷史」的範疇延展成一個宏觀角度下的人文研究，特別是將某些（若無法是全部）先前被排除在外的聲音和視角寫進來。正是在如此的理解下去閱讀《福爾摩沙三族記》，我們可更清楚地看出「多族」敘述的重要與必要，以及各個族群之間彼此相關但卻不同的無休止的互動與互涉（creolization）過程¹⁹。

在《福爾摩沙三族記》中，荷、漢、原住民三大族群之間隨著文化接觸而展開不同層次的融合。主要的面向表現在語言和日常生活細節上。語言和生活習性的選擇上則展現了隨勢而變的高度權宜性。例如為了生意往來的需要，漢人郭懷一與何斌等人皆說得一口流利的荷蘭文。傳教士如杜文達也因逐漸落地生「根」，決定和其原住民的妻子和孩子們在台灣定居下來。這背後也有著荷蘭政府不准他們的混血下一代回到荷蘭的苦衷。足見族群之間的混融與相互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個人情況，外在局勢等因素不斷地被磋商，也不斷地滑溢、錯位、與重組，從來不是單一面向的發展，而是共時的多元觀點交匯。

二、國姓爺的通俗想像

除了由歐洲、漢人、和原住民的三種不同視角來再現荷治 38 年的台灣歷史，《福爾摩沙三族記》的另一特色便是對鄭成功及其手下主將陳澤頗為人性的描寫。鄭成功在近代史上可謂傳奇人物，已有來自各國，版本各異的記錄和文學

以「事實」與「價值」的關係為中心〉，（來源：黃俊傑網站，<http://huang.cc.ntu.edu.tw/pdf/CCB2818.pdf>，2016 年 6 月 22 日）。

¹⁹ Creolization 有不同的中文對譯，但筆者以「互涉」稱之，指語言、文化習慣等不同層面的交混。

想像。在日本，因著鄭成功的母親為日本人，向來對鄭成功的故事有高度興趣。江戶時期，日本知名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曾於 1715 年將鄭成功的故事改編成「国性爺合戦」人形淨瑠璃（木偶劇），搬上舞台。不難想見，近松門左衛門的「醉翁之意」在於強調鄭成功與日本的血脈相通，而鄭成功（劇中名為「和藤內」）之所以要反清，也不意外地被詮釋成是為了宣揚日本精神，而非復興明朝²⁰。若將時間往後推至日治時期，旅台日人作家西川滿著有詩集《延平郡王の歌》，當中不乏對鄭成功作英雄式的描繪。四〇年初，西川滿曾寫就〈赤崁記〉描述鄭成功家族故事²¹。其實，日本領台以降，鄭成功母系一方的日本血統雖然持續為日人所津津樂道（例如台灣總督於 1897 年將延平郡王祠改作「開山神社」，供奉鄭成功，為其治台增加合法性），但鄭成功的「混血」身分，對講究血統純正的日本種族論述之學者而言，不啻造成界定「日本民族」時的一大挑戰，因此，與同化政策之間的齟齬在所難免²²。荷蘭文和中文的著作也皆因作者個人處境（如戰俘）與身分侷限（如部將）而折射出特定的鄭成功形象。荷文的資料如上述提及的《梅氏日記》，以及末任長官揆一匿名發表的《被遺誤的台灣》主要均不外乎是為一己辯護²³。中國方面較早的關於鄭成功

²⁰ 有關此齣木偶戲的背景與意義，參見 Donald Keene, *The Battles of Coxinga: Chikamatsu's Puppet Play, Its Background and Importance* (London: Taylor's Foreign Press, 1950).

²¹ 相關討論可參見 Ying Xiong 的 *Representing Empire: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Manchuria* (Leiden: Brill, 2014) 第三章，頁 122-142。此外，江仁傑的〈日本殖民下歷史解釋的競爭——以鄭成功的形象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則耙梳了日本領台期間殖民者（日本人）和被殖民者（台灣的漢人）對鄭成功各自不同的詮釋。

²² 實際操作上，日人與台灣人通婚在國籍認定上即困難重重。台灣人雖為「日本人」，但日治初期在台施行的「戶籍調查簿」制度仍有內地人、本島人（台灣漢人與平地原住民）、生番人（高山原住民）之別。曾在台灣任官的農業學者及殖民地史家東鄉實（1881-1959）在其《植民政策と民族心理》（1925）即強調儘管過去日本歷史上的種族混合，現代「日本民族」的純潔，對混血頗多負面評斷。關於日治時期種族通婚論述的發展，參見 Eika Tai, "The Discourse of Intermarriage in Colonial Taiwan,"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40.1 (2014), pp. 87-116.

²³ 《被遺誤的台灣》荷文版 1675 年於阿姆斯特丹出版，內容涉及諸多荷鄭決戰台江時期（1661 年 4 月 30 日至 1662 年 2 月 1 日雙方締和）的機要內幕，為揆一（Coyett）與其同僚（Socii）的「自辯」文書。先前有來台宣教的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的英譯，現有至少五種不同中譯本，最新者為 2011 年前衛出版社印行，許雪姬導讀之版本。《梅氏日記》亦有中文譯本。參見：揆一，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 年）。梅氏，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台北：漢聲雜誌社，2003 年）。

的資料則可見明鄭時期戶官楊英所撰寫之日記式、編年體史書《從征實錄》，之後有清代江日昇（明將領之子）所撰的章回體之鄭氏家族史《台灣外記》等，供明鄭史研究者參考²⁴。

陳耀昌對現有的關於鄭成功研究之資料並不陌生，且多所涉獵²⁵。小說《福爾摩沙三族記》在鄭成功的描寫上的確用力頗深。不但藉由其他角色烘托出這位戰將的不同人格側面和小細節（例如鄭成功信奉三太子，喜歡吃魚，且十分相信西醫等），也正面敘寫鄭氏帶兵的果斷與對忠誠的高度要求。小說約進行了三分之一，國姓爺才因要求荷蘭人推派一生去廈門為他治病這個楔子登場。透過鄭的族兄鄭泰，點明了鄭成功的疑心病（只接受拜爾開的外用藥，而非內服藥），也藉由被派至廈門的德國醫生拜爾，瞥見鄭成功不時重罰親人，或將兵士處死的嚴酷面，也因此拜爾醫生「每日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172）其他例子也可見於李科羅神父（鄭成功在唐山的朋友）在鄭氏策劃征討呂宋島時，召見他送信去呂宋島給西班牙總督前夕，對鄭成功此舉的多方忖度。惶恐的李科羅認為

……這種狂妄的語氣與做法，不是他所熟悉的國姓爺鄭成功。他印象中的鄭成功，戰場上雖自信而不胡為，一向會謀定而後動……他對洋人……至少繞個『理』字打轉。雖有時也許理不直而氣壯，至少不會像這封給西班牙呂宋總督的信，一味恐嚇……他想，國姓爺究竟怎麼了？（《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71-372）。

²⁴ 《從征實錄》又名《先王實錄》。較早問世的手抄本 1931 年由中研院史語所編纂成書。因書名難以辨認，北大的朱希祖將之題為《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1996 年景印版發行。1961 年另一傳抄本出土，經校訂補充，1981 年以《先王實錄校注》出版。關於其版本，參見周婉窈，〈楊英《先王實錄》所記「如新善開感等里」之我見〉，《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 年），頁 485-486。《台灣外記》則成書於 1708 年左右，之後版本眾多，流傳頗廣。關於其不同版本及此書的定位，參見盧淑惠，〈《台灣外記》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另參考：楊英，陳碧笙校，《先王實錄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楊英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纂，《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6 年景印一版）。江日昇，《台灣外記》第 30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²⁵ 《福爾摩沙三族記》的後記，陳耀昌羅列了數本觸及鄭成功之死的書籍，見《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91-392。

小說中也不乏貼著鄭成功的詩文而興發的橋段。如第 34 章「北伐」，描述了鄭成功在發展新戰術，及戰衣設計上的創意巧思，也直接徵引鄭成功的題為「出師討滿夷自瓜洲至金陵」的七言絕句來烘托其反清復明的心志及自負之性格。全書涉及鄭成功部分大多由第三人稱觀點，或是周邊人物的看法道出。不過在全書接近尾聲處，也有不少從鄭成功的內心出發，來揣想其觀點和感受，以「自由間接話法」(free indirect speech)，接近夾議夾敘的表述。這一手法的運用在鄭成功準備征伐呂宋島的「落幕」一章尤為明顯。例如，在尚未派兵之際，面對呂宋島的漳泉人士的傷亡，鄭成功自省「三十九年的人生，他一項自傲忠義節孝，如今似乎一場空。對父母未能盡孝，累及父弟，如今又要殺子、殺孫、殺妻，真是情何以堪。將士不從，妻兒背離，原鄉『安平』之名空設。而終生奮鬥目標的大明王朝已成泡影……」(《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75) 這長段的鄭氏心理分析在小說中並未以引號標出，也無「他想」等字眼明示，為「自由間接話法」的大段發揮。作者甚至細說從頭，寫道「三十九年來，他歷經了太多苦難。從孩提起，他沒有享受過完整的家庭溫暖……」(《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74) 似乎為最終的「後記：我為什麼寫《福爾摩沙三族記》：兼以醫師觀點論鄭成功之精神分析及死因」做鋪墊。作者以醫生的專業判斷，不但提出不管是鄭成功，或是他的屬下馬信，兩人都極有可能是死於「自殘」(《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94)，還進一步推測鄭氏軍隊的信奉三太子與鄭成功自己以哪吒自況不無關係。

基於史料的有限，以及版本不一，今日已無法完全還原鄭成功的形象，亦難以推斷其死因究竟為何。陳耀昌在現有的文獻上加以想像和臆測，特別根據荷蘭方面的材料，將鄭氏娶了亨布魯克的小女兒為妾之細節織入其鄭成功書寫中，讓長期被神化，英雄化的鄭成功有了相對「人化」的形象。與歷史學者歐陽泰在《決戰熱蘭遮》一書中對鄭氏父子的「另類」描繪幾乎如出一轍²⁶，類似的手法也可見於其他小說家（例如平路的《行道天涯》對「國母」宋慶齡的

²⁶ 歐陽泰在書中不但懷疑鄭芝龍與其雇主李旦可能有著同性戀關係，也根據 1654 年白耶爾醫生為鄭成功的診斷猜測鄭成功可能死於梅毒，書裡也提及鄭成功與眾妾們一同作樂，同樣折射出一個極為人性的鄭成功形象。參考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台北：時報出版社，2012 年)。

情慾的描寫)。但陳耀昌的鄭成功去神化並非全靠小說家的虛構和想像，更接近是自現存的歷史素材出發的擴充與演繹。此一由歷史興發而來的手法，則為書裡另一種增強鄭成功的「人」格手法。這種筆法在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片段最為明顯。茲列舉兩例。一是在荷蘭的評議會決定不再繼續與鄭成功軍隊對峙，揆一被迫投降後，作者藉由陳澤之口，描繪了鄭成功因獲勝在即，心血來潮地表演精湛的騎射術。整整一頁（《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53）的篇幅來論鄭成功的武術，語調輕鬆，雖非全出自杜撰（在《梅氏日記》中已有記載），然而安插於陳澤與瑪利婭的對話中，仍稍顯突兀。

另一例是藉由克莉絲汀娜的觀點來側寫國姓爺在人後的軟弱面。克莉絲汀娜告訴姐姐瑪利婭，「我覺得國姓爺有點像希臘神話的伊底帕斯，為了母親而不知不覺憎恨著父親。而他母親又不在了，所以他一直在尋求母愛。」「說起來很好笑，國姓爺有時似乎把我當成了母親……」（《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60-361）。也是由克莉絲汀娜之口，揣想了鄭成功對柳如是的仰慕之情，或幾近「移情」地寵愛克莉絲汀娜，間接地勾劃出馳騁海上的戰將鄭成功私下七情六慾之一面。作者在小說「後記」又再度提及鄭成功的欲求母愛和伊底帕斯情結，及其在安海時期的孤寂經驗。而對鄭成功臨終前的描寫，其一生功業只換來「父死，君亡，子不孝，臣抗命，民被殺」（《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75），自殘前遙想的人生之樂，盡是愛慾纏綿（與克莉絲汀娜共處的日子）。至此，情慾與國族激情的張力被抬至頂點，鄭成功作為悲劇英雄的型塑於焉完成。

關於鄭氏的伊底帕斯情結，七〇年代末，郭適（Ralph C. Croizier）在其專著《國姓爺與中國民族主義：歷史、神話與英雄》便曾以此因素來解釋鄭成功與父親鄭芝龍的決裂，和之後鄭芝龍及其他家人因他而死的「弑父報國」行為²⁷。這些相對較為陰翳特質的鄭成功形象已有前例可循，也非全出自杜撰（如作者徵引了《台灣外志》），但不可否認，當中的細節仍有待作者的想像力來綴補。

²⁷ 參見 Ral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郭適在書裡也指出，鄭成功雖然奉明朝為正朔，但實際行為並未履行「勤王」之責。其對明朝的忠誠似乎言辭勝於具體實踐。在台灣，關於鄭成功在台灣「開國立家」，將台灣改作「東都明京」的作為也頗有歧義。有者將之解讀為鄭氏的自立為王，在台建國，有者認為這正是其忠於明朝正朔，期許反清復明的表現。

是否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見各異。但與近年來學者對鄭成功反思台灣的「海洋性格」論述，試圖超越大陸／海洋論述的二元思考相對照，陳耀昌的國姓爺描摹大抵意在「還原」鄭氏的性格側面，而非台灣的海洋性，或海盜性格可能啟動的理論系統或認同基礎²⁸。

然而，逝者已矣，真相難明。這個未定的狀態，讓歷史學者與作家，得以繼續提出不同的推論和編造。不過，作者從較鮮為人知的俗世人情面向來寫鄭成功，倒頗具通俗歷史（popular history）的嘗試²⁹。這個通俗的轉向至少可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是語言上的特色，第二是情節上的私人化。關於前者，可見於一些閩南語語彙如「飼老鼠，咬布袋」（《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284）、「凸槌」（《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47）、「緣投」（「英俊」之意，《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66）等運用。至於情節上的變化，縱覽全書，與鄭成功攸關的敘述接近書的尾聲時，焦點轉向了兒女情長。陳澤與瑪利婭從陌生到成夫妻之實，陳澤臆測鄭成功對瑪利婭的妹妹的一見傾心，瑪利婭與妹妹的道別等娓娓道來。相形之下，與台灣日後的政治格局攸關的南京之役，或清朝挾持鄭芝龍招降鄭成功的父子情仇，和鄭成功移孝作忠的糾葛，卻不見太多著墨³⁰。作者的如此取捨使得整部小說的步調快慢不一，虛實的嫁接未必盡善盡美，但卻也因這些無奈的人世因緣，生死離別，令全書自第六部 1661 年的荷、鄭交戰到最後一部（第九部）「命運」一連串砲火硝煙的時局劇變中，有了相對柔性、抒情的點綴。

²⁸ 廖成浩近年來在「形構台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計畫中的「遊牧與後中國動能：重讀海洋」子計畫即為一例，參見計畫網站：http://ts.ntu.edu.tw/project/super_pages.php?ID=project1。李昂 1991 年的小說《迷園》則為另一例證。書中對女主角朱影紅的家族史亦追溯到十七世紀效忠明朝的海盜，令人聯想到鄭成功，而女家長則刻劃成為具山地人、荷蘭人血統的福建移民後代，頗有以海盜的冒險精神與貿易本領啟動台灣想像的意味，同時也強調台灣人的混種文化。參考：李昂，《迷園》（台北：麥田，1998 年）。

²⁹ 關於歷史是否走向大眾，或如何走向大眾，近幾年來在西方已有不少討論。參見 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8)。若以鄭成功形象從國族史學轉向敘事史學，周婉窈〈海洋之子鄭成功〉的嘗試亦為一例。首頁網址見 [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8/12/02/海洋之子鄭成功\(一\)/](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8/12/02/海洋之子鄭成功(一)/)。

³⁰ 1659 年，鄭成功和反清復明的領導人張煌言合作攻打南京，但因戰略錯誤而失敗。關於這場戰役，可參閱張煌言《北征得失紀略》。之後，鄭成功欲以台灣為安頓官兵之地於 1661 年攻台，次年 2 月 1 日荷、鄭締和。鄭成功數月後猝死。張煌言繼續抗清，期盼魯王（朱以海）能承繼明朝正統，但魯王不久也辭世。張煌言於 1664 年落入清人手中，慷慨就義。參見：張煌言《北徵得失紀略》（成都市：巴蜀書社，1993 年）。

三、查某的成長小說兼家族史

除了以上兩種閱讀方式，《福爾摩沙三族記錄》也可當作家族史故事來看待。家族史的角度，如同作者對鄭成功的摹寫一樣，使讀者得以從一個相對較為人性、親密的（來自台夫特的亨布魯克 Antonius Hambroeck 家族）視角來重新省思台灣在世界大航海年代之歷史。這段關於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新教牧師亨布魯克遠道而來，在福爾摩沙麻豆地區為期十三年（1648-1661）的宣教工程（例如麻豆神學院的規劃及設置等史實），迄今在文學的鋪就上尚不多見，陳耀昌將之寫入小說，甚或以亨布魯克家族第二代來串起全書，別開另類從荷蘭（人）看台灣之角度。亨布魯克遭到鄭成功殺害一事也隨著揆一《被遺誤的台灣》於1675年之出版在荷蘭傳布，有了不同媒介的演繹。例如諾姆茲（Johannes Nomsz.）在1775年將這段故事寫成《福爾摩沙圍城悲劇》（Anthonius Hambroek of de belegering van Formosa）出版³¹，接著1810年荷蘭畫家 Jan Willem Pieneman 以此主題完成畫作³²。比起荷蘭版本對亨布魯克的推崇，《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的亨布魯克的形象更為逼真且多面。不過，在大篇幅的貼近歷史的文學鋪墊後，作者的歷史欲望在「後記」終究全盤宣泄而出。除了替鄭成功的殺害荷蘭傳教士給出「殘忍但非特別過分」（《福爾摩沙三族記》，頁390）的個人判斷，甚至疾呼「然而，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福爾摩沙三族記》，頁390）似乎也提點讀者，亨布魯克的「殉道」一說是否成立見仁見智。

除開家族史的敘述，《福爾摩沙三族記》中對女性角色的刻劃格外引人側目。以全書的漢人、原住民、荷蘭人「三分天下」之姿，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漢人部分的敘事顯得陽氣十足，若非市儈的經商高手，便是驍勇的戰場英豪。相較之下，原住民的部分和荷蘭人部分的書寫有較多的柔情。這兩族較為鮮明的

³¹ 關於諾姆茲劇作之討論，參見 Jean-Paul G. Potet, *Koxinga of Taiwan* (Raleigh, NC: Lulu Press, 2015), p. 62。此劇作已有中譯本，參見《福爾摩沙圍城悲劇》（台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

³² 1935年，慶祝始政四十年，日本人請畫家小早川篤四郎創作一系列台灣歷史畫。小早川邀顏水龍創作當中一幅，即題為「傳教士范無如區訣別圖」之油畫。顏水龍後因發現原畫遭修補而自己的名字已被抹去，於1989年重畫。相關討論見黃琪惠，〈再現與改造歷史——1935年博覽會中的「台灣歷史畫」〉，《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0期（2006年3月），頁109-173。

女性角色分別是麻豆社少女烏瑪和荷蘭牧師亨布魯克之次女瑪利婭。關於原住民的部分，烏瑪象徵著新的一代，即荷蘭人治理下成長的一代，在一些信仰儀式、生活習慣上均受到影響（如：婚後她受到基督教影響，選擇搬出去和丈夫直加弄自組小竹屋，過兩人生活，而非按照西拉雅族習俗，婚後繼續夫妻分居，直到男性從部落征戰組織退下後才自組家庭）。然而，也因這些新觀念，導致烏瑪與婆婆佟雁（本身是女祭司）之間的衝突，佟雁按部落習俗讓烏瑪流產³³。不論烏瑪抑或佟雁，她們的角色都與生育繁殖相關。佟雁身為傳統的女祭司（尪姨）自然被賦予生殖的仲裁者和墮胎執行者之職責，而小說中關於烏瑪的描寫也不只一次提及原住民的人口成長有限，不敵大量增加的漢族移民。

瑪利婭在結構上有鏈接之作用，因此特別重要。小說其實可由瑪利婭的個人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角度來詮釋。在德文的原意中，成長小說指描寫主人翁經歷「成型」（*formation*）或精神教育，而漸趨成熟的過程。整部《福爾摩沙三族記》確實可被視作瑪利婭「從少不更事的少女成長為大人」（《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60）的經歷。瑪利婭在剛隨著父親亨布魯克遷居台灣時，年方十六，仍處懵懂階段。她不明白何以父親決意舉家離鄉背井，搬到「蠻荒」的福爾摩沙。將近一年的浩蕩航程讓她大開眼界，接觸來自各地，要到亞洲一試身手的冒險者，也首度領悟這一去並不一定能歸返。從巴達維亞抵達台灣後，與福爾摩沙人（特別是麻豆社的女孩烏瑪）的互動，讓她得以對照先前書中讀到的關於福爾摩沙的記錄（如家族觀和兩性相處的道德觀）與自己的親身經歷有何差別。接下來，她亦陸續從父親處獲取關於台灣的知識，作者甚至安排了她親自造訪郭懷一的家，意識到即便在在台的荷蘭人群體中，也觀點各異。透過她的視角，福爾摩沙島嶼上各族在軍事、商業利益上的多番競逐、相互制衡、甚或對峙的權力消長一幕幕地展開。

除了提供觀察各族時而結盟，時而分化的相對應關係，瑪利婭更被作者賦予了擔任鄭成功「女通事」一職，讓荷蘭人的敘述與漢人的敘述在小說結構上具體

³³ 關於當時西拉雅族群女性在結婚初期，不被准許懷孕之習俗，參見荷蘭宣教師甘治士（George Candidiur），葉春榮譯註，〈荷蘭據初期的西拉雅平埔族〉，《台灣風物》44卷3期（1994年9月），頁193-228，及John Robert Shepherd,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Virgini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交織在一起。一如通事的職務為翻譯和協商，瑪利婭與國姓爺的會面讓作者得以藉由瑪利婭為媒介，從她的觀點敘述鄭成功。敏感的她，似乎看穿了國姓爺的心事重重，如「國姓爺不像是個神采飛揚的英雄，倒像一個背了不堪負荷重擔的苦行者。她想起普羅米修斯。」（《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272）而她也觀察到國姓爺見到她和妹妹時，「臉上閃過驚訝表情。」（《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272）全書共有兩次瑪利婭與國姓爺的會晤。第二次作者寫道，國姓爺送了一對玉鐲給瑪利婭姐妹。這些小細節乍看無關緊要，但讀畢全書便能知曉這些細節為之後的鄭成功納瑪利婭的妹妹為妾做鋪墊，而瑪利婭被「賞賜」給鄭成功手下將領陳澤為妾的演繹也顯得合情合理。因此，瑪利婭在小說情節上的「串場」作用十分明顯。一些史料記載亨布魯克的小女兒成為鄭成功的妾，雖然日後在遣散荷眷時被允許離台。但關於陳澤的後代記載則不大詳細。作者認為「背後可能藏有不為人知的故事」（《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83），也因此發揮想像，鋪陳了「落花」、「拉鋸」、「人間」等三章極度人性化的摹寫，臆想瑪利婭在荷蘭投降後的心理感受。

「落花」以道別開端（即瑪利婭和妹妹被迫與父母及弟弟分離），然後寫瑪利婭及其平常的用餐、沐浴更衣等複雜而矛盾的待「納」女兒心（即將被發配給漢人將領陳澤做妾）。「拉鋸」一章的標題一語雙關，不但指涉鄭成功軍隊與荷蘭人的拉鋸，也同時是被發配給陳澤的瑪利婭與陳澤面對面的兩性拉鋸。從兩人第一次的目光交會，到陳澤外出，然後寫瑪利婭的孤單心態，對初戀情人的懷想，「瑪利婭的小圍城世界，平靜下來；熱蘭遮成荷蘭人的大圍城世界，戰後依然進行著。」（《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28）此一瑪利婭的私密的內在情緒與外在的大變動並置，更突顯個人命運的不可捉摸。到了「人間」一章，個人慾念與征戰的激情有了連結。瑪利婭因想念家人而落淚，竟讓陳澤大展鐵漢柔情，瑪利婭終於選擇接受陳澤，兩人有了夫妻之實。小說如此描寫：「令她心酸的是，讓她成為婦人的，不是楊恩³⁴，甚至不是荷蘭人或歐洲人，而是一位漢人敵人。」（《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36）乍看之下，如此情節轉折或可以被解讀為漢人的軍事勢力和漢人男性權威之於荷蘭人（不論男女）的勝利。但這種

³⁴ 瑪利婭在荷蘭台夫特的昔日戀人，故事中在台夫特的一場爆炸案身亡。

以女性的身體作為處於劣勢一方（如殖民地，或戰敗國）的政治寓言或祭獻的詮釋似乎太過簡化。再者，瑪利婭對陳澤不盡然完全沒有感情。事實上，她「感謝陳澤沒有用對待戰利品的態度對待她，這也讓她對陳澤沒有敵意，甚至有好感。」（《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26）這讓兩人之間的關係拋開了狹隘的敵我之別，導向超越族群的，最「人間」，也極其世俗的男女情愛。

作者陳耀昌對這對因戰爭而意外結合的異國男女的鋪陳並不僅僅止於兒女私情，更有一份倫理的期許。在緊接著的「天上」一章，安排了陳澤代替鄭成功，對已被殺害的瑪利婭的父親及弟弟表示遺憾，在墓前祈求瑪利婭的父親亡靈之諒解。這份遺憾在「聖母」則有進一步的和解。陳澤送給瑪利婭一尊在馬尼拉購買的聖母瑪利亞像。瑪利婭與聖母恰好同名，戰爭的不仁藉著宗教的名義轉瞬間翻轉成兩人註定會相逢的緣分。陳澤說：「我們漢人都相信緣分，我感謝我們的神，也感謝你們的神，讓我們能有這個緣分。妳們荷蘭人有沒有『緣分』這個字？」（《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45-346）瑪利婭答：「我知道，大概是 *destinatie* 的意思。」（《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46）這個「帶些東方韻味」的聖母像儼然是兩者（族）之間締和的信物，例如陳澤承諾瑪利婭，要試著說服國姓爺，讓他在攻打熱蘭遮城時退居二線，瑪利婭「完全接受了陳澤」（《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46）。無獨有偶，正當鄭成功有了大清的奧援而計畫攻城時，瑪利婭發現自己已懷孕。而正當陳澤告知瑪利婭荷蘭已投降，戰事結束，即將展開遣返荷裔人士，瑪利婭卻決定在福爾摩沙留下來。於此，可看到女性的身體、心理、以及生理層次的認同與歸屬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與外在男性為主的戰爭暴力緊密地勾連，且自成一個在戰場殺戮外的豁免空間。瑪利婭的懷孕更將此「生理政治」（*bio-politics*）推向極致³⁵。

瑪利婭的懷孕深具象徵意味。和杜文達等牧師們決意留在台灣有所不同。因局勢考量（例如混血小孩不能回到荷蘭）而來的務實性被沖淡³⁶，多了更高

³⁵ 小說裡還有其他的「生理政治」（即將個人的肉體慾望和戰爭的政治熱情並置）之例子。如：國姓爺在喪失六個嬪妃後，「把心思都放在軍事行動」（《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64）；瑪利婭的妹妹克莉絲汀娜更因國姓爺對其的喜愛，而要求他不要濫殺，他也真的做到（《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64），頗有以身體作為和平的交換。

³⁶ 小說提到「反正」帶著小孩無法回荷蘭，與其到巴達維亞找人嫁，「寧可」留在福爾摩沙

層次的族群相互尊重的意涵。瑪利婭向妹妹訴說的「……漢人不信仰基督教，但他們有自己的道德觀……我並不是說東方優於西方，我只是說，從和陳澤的相處，我了解了一些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因而更能設身處地設想，如此而已。」（《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66）這個尊重彼此差異的寬容，不但呼應了葛里桑所言的動態的、開放的「關係詩學」，也同時啟動了多元的、互涉的台灣敘述的無限想像。瑪利婭的模樣和陳澤所送的（帶有東方韻味）的聖母像在「道別」一章的收尾疊合，也預示一個混血的、女性的台灣書寫的開始。作者在「尾聲」一章將全書獻給「台灣福佬的荷蘭查某祖」（《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84），點明了《福爾摩沙三族記》不僅僅只是自身的家族史溯源的期待，更為台灣漢人族群的荷蘭（西歐）血脈作了深情的回顧。

陳澤之於瑪利婭，鄭成功之於克莉絲汀娜，機靈的讀者大可搬出成套理論來論述背後的男／女，勝利者／戰敗方的權力結構，作出女性身體總是乏善可陳地一再被政治形勢所操弄的結論。按此理路，若以福佬人的觀點來看，那麼，兩位白種女人先後被納為漢人男性的妻妾不啻為一則漢族「出頭天」的反殖民權力翻轉。與類似的文學作品，例如平路的《婆娑之島》中的兩段交織的白人男性與台灣女性（原住民女性娜娜，和現代漢族女子羅洛萊）相比，平路的「性別化」（白人殖民）帝國想像顯然有其侷限，難以跳脫台灣（女性）在種族議題，或在政治地位上被殖民的窠臼。

然而，若將陳耀昌小說中的漢人男性之於白人女性的關係視作一種逆寫，也仍舊受制於敵／我的二元論。儘管故事中安排了讓瑪利婭，克莉絲汀娜對陳澤，鄭成功動情情節顯得天馬行空，甚或有些避重就輕，但從兩姐妹去留的不同選擇，與瑪利婭的懷孕來談，倒也拓展了「台灣人」之定義，並顛覆了以福佬（男）人作敘述主軸的歷史編寫。而瑪利婭的離開台夫特，到台灣的生活適應與文化調適，再到自認為是「福爾摩沙的瑪利婭」則成了不折不扣的荷蘭人

（頁 366）。此一不能回到荷蘭的限制即人類學者 Ann Laura Stoler 所言的「內部疆界」（interior frontier），即混血被視作對國家的一種威脅，因此有了種種種族或文化上的制約。參見 Ann Laura Stoler, "Sexual Affronts and Racial Frontiers: European Identities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xclusion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n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199。

離散故事³⁷。從當今反離散的觀點來審視，可謂一則移居者殖民的在地化，最終他鄉變家鄉的過程。瑪利婭的台灣認同，與她來自荷蘭的事實並不衝突。「我是荷蘭人，但我也是福爾摩沙人」（《福爾摩沙三族記》，頁 366）。她留下初戀情人楊恩送的笛子，也珍藏陳澤送的象牙聖母像。這兩樣物件，正如她的認同信物，凝聚著她同時是荷蘭人與台灣人的「雙重意識」。「雙重意識」一詞由 W. E. B. Du Bois 於 1903 年提出，指美國的黑人分裂重層的認同經驗。但《福爾摩沙三族記》中瑪利婭的雙重認同，少了歷史積累下的種族問題，與 Du Bois 所指涉的語境不同³⁸。以此看來，她摔碎了鄭成功贈送的玉鐲，如果我們以忠於明朝的愛（中）國之士，而非避走東寧獨立稱王的形象來看鄭成功，那麼，玉碎則多了一層「斷陸（中國）趨海（海洋論述）」的象徵意義。

四、結論

本文從三個角度來剖析陳耀昌的《福爾摩沙三族記》，論證了此小說在歷史再現上的特色。一、荷蘭、原住民、漢人三大族群交替的多元敘事觀點；二、鄭成功的摹寫上所具的通俗面向；三、以女性（特別是虛構的女主人翁瑪利婭）為中心的成長故事。在多元書寫方面，三族所分配到的篇幅其實並不平均，敘述的精緻度也不大一致。或許作者個人有所偏愛，也或許是因素材的侷限，不過大抵符合作者在楔子所言，台灣的歷史一開始便是一部世界史。荷蘭時期的三十八年，三大族群即無時無刻地互動，相互合作，也相互競逐。筆者援引葛里桑的「關係詩學」來進一步闡述各族之間的動態關係，並採新歷史主義的立場，說明文學和歷史同樣受制於敘述者的觀點和修辭，難以完全地一刀兩分。在鄭成功的描繪上，與小說的多元敘述異曲同工，鄭的形象具有不同層次，善戰多情兼有，雄姿英發的自負背後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對母親的欲求和寂寥。至於女性的刻劃方面，尤

³⁷ 關於荷蘭帝國在亞洲的離散現象，可參見 Howard J. Wiarda, *The Dutch Diaspora: Netherlands and Its Settl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the America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第八章。

³⁸ 當時的語境下，黑人常被貶抑，因此對於在美國生活的黑人來說，他們心中的黑人認同和美國人的認同難以共存。一方面他們從黑人的角度型塑認同，但另一方面也透過他人（白人）的視角看自己，故有「雙重意識」。參見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9)。

其是敘寫瑪利婭和陳澤部分的文字，下筆情深意重，在生理政治層面上多層展演，不但包含了天上人間，也兼顧俗情倫理，為全書最富小說感與想像力之處。

歷史的書寫多以古鑒今，但《福爾摩沙三族記》以今溯古，一路往前追溯到荷蘭台夫特的宣教士來台，從多元視角與（荷蘭）女子的觀點重新梳理了在大漢本位下甚少詳述的荷治「史前史」³⁹。自解嚴以來，台灣的本土論述挾以後殖民論述漸成論述主流。福佬人的文化國族主義從膨脹、激進，到逐漸的自省、開放，對認同的討論漸趨寬容。然而，當原住民族群因著他們的在地時間最長，而被視作建構台灣本土性的終極元素時，我們必須反思是否陷入本質化的危險（即原住民本身隨著歷史的演變，已是文化同化或族群融合的結果），也必須更審慎地去看看待在地性（indigeneity）和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與合法性（legitimacy）間不必然的對應關係⁴⁰。歷史的偶然，延展出在台灣土地上先來後到的生活經驗，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見證了至少三個族群的互涉關係。在同一時空和語境中，如何敘述這段共有的歷史（shared history），怎樣再現這「同」而不化約當中的「異」不啻是文學家與史學家的一大挑戰。

一個族群的認同，國族與自我認同亦然，不可避免地以另一族群作為他者而建構。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已有不少理論可供參考，例如「他者」的理論宗師拉康的心理分析指出，孩童們的自我形象的認知從與鏡像的自己分裂或異化而生⁴¹，傅柯則以社會結構或機制的權力宰制來解釋，叩問誰決定孰謂他者？誰有權再現他者？又，敘述或書寫他者的背後又存有什麼動機？以何種方式來再現⁴²？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則反省西方哲學壓抑「他者」的傾向，大

³⁹ 歷史敘述本身難以完全客觀中立。標榜「荷治」本身已暗指了漢人和原住民的退位。同理可證，先前的教科書指鄭成功「收復台灣」，但若原不歸鄭氏，何來「收復」。若說他「驅逐荷蘭」，則難免漢人本位。就新歷史主義來說，每一次的敘述，不論有意無意，都不全然是過去真實的重構，而是詮釋的結果。

⁴⁰ 邱貴芬曾為文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學「在地性」意義的生產問題，參見 Kuei-fen Chiu, "Empire of the Chinese Sign: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 in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7, no. 2 (May 2008), pp. 593-620。但我們可進一步追問「在地性」和「本真性」不見得等同。

⁴¹ 參見 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i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1-7.

⁴² 參見註 15 的兩本傅柯專書。

力疾呼「為他」的倫理學⁴³。重回十七世紀的歷史現場，如何再現當時原、漢、歐三族匯流於台灣島上的痕跡，《福爾摩沙三族記》多元的敘事放到傅柯和列維納斯的框架下思考，意義最為明顯。

若採傅柯式的解讀，那麼這部小說是單一漢人敘述的拒斥，也是逸出國族英雄史的人的故事。從列維納斯的「為他」呼籲來談，或可將之視作「為它（台灣）」的一次以土地為主的，關於不同族群的「關係詩學」的實驗與實踐。而在此層次上，我們不妨也將德里克（Arif Dirlik）的「以地域為基礎的想像」一併列入思考⁴⁴。《福爾摩沙三族記》以台灣為基礎，想像了一個有別於一般漢族男性史觀之外的，一個具多重認同的荷蘭女性為開端的版本。台灣作為多個族群命運交織，利益相互角力的場域，歷史本為錯綜多元的，也因此，其歷史再現勢必是開放而多視角的。以台灣作為最大的公約數，去探究其背後族群混融的豐富層次，權力糾葛，政權更迭，而盡可能避免粗暴地以單音線性史觀將其台灣的過去扁平化、政治化，或可為小說參與歷史之意義的最佳總結。

⁴³ 參見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⁴⁴ Arif Dirlik,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22, no. 2 (1999), pp. 151-187.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王家祥，《倒風內海》（台北：玉山社，1997年）。
-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年）。
- 平路，《東方之東》（台北：聯合文學，2011年）。
- ，《婆娑之島》（台北：商周出版社，2012年）。
- 包樂史等編，林偉盛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1冊 1623-1635（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年）。
- 包樂史等編，康培德譯，《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2冊 1636-1645（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年）。
- 包樂史等編，《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3冊 1646-1654 英語版（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06年）。
- ，《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4冊 1655-1668 英語版（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11年）。
- 江日昇，《台灣外記》第3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1999年）。
- ，《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
- ，《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4年）。
-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10年）。
- 李昂，《迷園》（台北：麥田，1998年）。
- 村上直次郎日譯（パタヴィア城日誌），郭輝中譯，王詩琅、王世慶校訂，《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
- 村上直次郎日譯（パタヴィア城日誌），中村孝志日文校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三）（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00年）。

- 周婉窈，〈楊英《先王實錄》所記「如新善開感等里」之我見〉，《海洋與殖民地台灣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頁485-486。
- 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錄》（台北：遠流出版社，2012年）。
- 梅氏，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台北：漢聲雜誌社，2003年）。
- 張煌言，《北徵得失紀略》（成都市：巴蜀書社，1993年）。
-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
- 揆一，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年）。
- 楊英，陳碧笙校，《先王實錄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纂，《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6年景印一版）。
-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台北：時報出版，2012年）。
- 諾姆茲，王文萱中譯，《福爾摩沙圍城悲劇》（台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
- 鮑曉鷗，李毓中、吳孟真譯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台北：南天書局，2008年）。
- Andrade, Tonio,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arr, Edward Hallett, *What is History?* (London: Penguin, 1961).
- Chiu Hsin-hui,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 Croizier, Ralph C.,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De Groot, Jerome,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8).
- Du Bois, W. E. 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9).

- 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Vintage, 1988).
- ,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95).
- Glissant, Édouard.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 Betsy W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Keene, Donald, *The Battles of Coxinga: Chikamatsu's Puppet Play, Its Background and Importance* (London: Taylor's Foreign Press, 1950).
- Lacan, Jacques,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I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1-7.
-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Potet, Jean-Paul G., *Koxinga of Taiwan* (Raleigh, NC: Lulu Press, 2015).
- Shepherd, John Robert, *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century Siraya* (Virgini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 Shih Shu-mei, "Comparison as Relation." In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eds. Rita Felski and Susan Fried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9-98.
- Stoler, Ann Laura, "Sexual Affronts and Racial Frontiers: European Identities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xclusion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In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eds.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98-237.
- Wiarda, Howard J., *The Dutch Diaspora: Netherlands and Its Settl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the America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 Xiong Ying, *Representing Empire: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Manchuria* (Leiden: Brill, 2014).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甘治士，葉春榮譯註，〈荷蘭據初期的西拉雅平埔族〉，《台灣風物》44 卷 3 期（1994 年 9 月），頁 193-228。

陳宗仁，〈評鮑曉歐著《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台灣史研究》17 卷 1 期（2010 年 3 月），頁 211-222。

黃琪惠，〈再現與改造歷史——1935 年博覽會中的「台灣歷史畫」〉，《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0 期（2006 年 3 月），頁 109-173。

蘇惠昭，〈幹細胞專家陳耀昌的福爾摩沙夢〉，《光華雜誌》37 卷 5 期（2012 年 5 月），頁 98-105。

Chiu Kuei-fen, "Empire of the Chinese Sign: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 in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7, no. 2 (May 2008), pp. 593-620.

Dirlik, Arif,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22, no. 2 (1999), pp. 151-187.

Lin Pei-yin, "Gender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Romance and Geopolitics in Li Ang's Seven-Generation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and Ping Lu's East and Beyond," *Archive Orientani* (January 2014), pp. 515-538.

Slotkin, Richard, "Fi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9: 2/3 (June/September 2005), pp. 221-36.

Tai, Eika, "The Discourse of Intermarriage in Colonial Taiwan,"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40, no.1 (2014), pp. 87-116.

White, Hayden,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Fiction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ality," *Rethinking History* 9: 2/3 (June/September 2005), pp. 147-57.

(二) 學位論文

江仁傑，〈日本殖民下歷史解釋的競爭——以鄭成功的形象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盧淑惠，〈《台灣外記》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三、電子媒體

周婉窈，〈海洋之子鄭成功〉的嘗試亦為一例，（來源：[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8/12/02/海洋之子鄭成功\(一\)/](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08/12/02/海洋之子鄭成功(一)/)，2016年6月22日）。

黃俊傑、古偉瀛，〈中國傳統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與「價值」的關係為中心〉，（來源：黃俊傑網站，<http://huang.cc.ntu.edu.tw/pdf/CCB2818.pdf>，2016年6月22日）。

廖咸浩，〈「遊牧與後中國動能：重讀海洋」〉，「形構台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計畫網站，（來源：http://ts.ntu.edu.tw/project/super_pages.php?ID=project1，2016年6月22日）。

